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美〕 窦宗仪 著
刘成有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美〕 窦宗仪 著
刘成有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08号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美] 窦宗仪 著

刘成有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兰州大学校内)

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1/32 印张: 7.5

1993年01月第1版 1939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79 千字 印数: 1—1000册

ISBN7-311-00669-4/A·7 定价: 6.50元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美〕窦宗仪 著

刘成有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谨将此书
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

别有见识的比较研究

——读窦宗仪教授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中国是一个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东方大国，儒家的思想长期占着统治的地位。但是，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短短的30来年的时间，就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很多人都曾亲身参加和经历了这场历史变革，他们对马克思在中国的胜利并不感到有什么奇怪。然而在西方，即使事后很长时间，许多人仍然觉得难以理解。他们不明白，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儒学之邦”的中国很快扎根、生长、开花、结果？也不明白，一直受着儒学思想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很快地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华裔学者窦宗仪先生经过20多年的潜心研究，把儒家学说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仔细的比较，发现两家在哲学认识论上有许多共同点和共通处。他认为这就是原因之所在，这就是问题的答案。

窦先生的著作，书名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刘成有同志译出书稿后，希望我能写几句话。其实，我同窦先生早有接触。先生祖籍是中国兰州市榆中县，近些年多次回国，几乎每次都到兰州大学访问、讲演、座谈。我同他第一次见面，就听到他介绍其书中的观点。我和刘成有同志有一层师生关系，这本书就是他在攻读硕士学位时开始翻译的。所以，我很高兴谈谈我的一些感想。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很快就取得伟大的胜

利，首先的和最主要的原因，是它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腐败的封建政权相互勾结，中国社会一步一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传统的儒学思想，既不能外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更不能内扫封建政权的腐败统治。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自然把眼光投向当时强盛的西方，企图从那里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以基督教神学为指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了，以进化论和改良主义为指导的戊戌变法失败了，以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指导的辛亥革命也失败了。这时候，俄国发生了伟大的十月革命，迷惘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下子从中看到了希望，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新的思想武器。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与马克思主义同时流行的还有自由主义、乌托邦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实用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但是，它们虽然看起来新鲜，实际都是行不通的。只有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和道路。正如寅先生所讲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他在书中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曾听过杜威和罗素在湖南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讲演，但没有跟着杜威和罗素走，还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这说明，“与西方帝国主义的行为相反，马克思主义从苏联传入中国，不是靠军事入侵，而是靠中国人自己的斗争实现的”。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什么外部力量所强加的，而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自己找到的、选择的和吸收的。而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又不断增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一点，我认为先生在本书正文中强调不够，倒是在附录一、二中讲得比较清楚。

不过，作者所说的儒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一些相似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我很赞成先生的这种观点：“大凡一种思想体系和制度要移置到另一种思想体系和制度内，两者如

果越接近就越容易开花结果，两者如果差距过大，那就很难适应。历史上的两种文化的交融演变，大致都遵从这个历史法则。”中国人是站在自己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接受、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如果两者没有任何相似、相通之处，便很难在思想上消化，更很难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为了说明儒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似和接近，先生“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的基础”，分别从认识的源泉、对象、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及实践基础和实践标准等方面，同儒家的“格物致知”、“道”论、“理气”范畴、“理（道）器”范畴、“正名”说以至“诚”、“力行”和“知行合一”等方面，一层一层地进行了比较研究。这是一项具有开拓意义的工作，海内外还没有人象他下过这样大的功夫。我认为，他的研究方法、研究工作及其所得出的结论，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为他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在这条思路上有发现。这一点完全为前人所未言，而中国学者过去对此不大注意。由于他自幼就诵读儒家的著作，对儒学有着很深的根底，同时又十分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的著作，他的比较分析是有相当说服力的。由于他对西方学者上述的疑惑，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答案，自然引起海内外学术同仁的浓厚兴趣。

我认为，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的确有一种相似性或相通之处，但这种相似性或相通之处不能过分夸大。如果说在认识论上“两者的基本前提十分接近”，不过是“大同小异”，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只须对传统儒学作一些小小的修正，而不必去接受马克思主义，更不必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而历史的事实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正因为传统儒学无法完成近代中国的历史使命。我们可以拿儒家的知行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与实践的理论进行比较，且不说儒家内部在知行问题上的种种分歧，即使那些具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性质的观点，也主要局限于道德修养。历代儒者不但不大重视对于

自然现象的研究，而且很少注意到生产活动、科学实验和道德之外的其他社会实践。由于这个缘故，传统儒家学说既不能在政治上成为民族解放的思想武器，也不能在经济上指导民族经济的发展。

作者在比较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时，主要引用的是宋明理学的材料。在宋明理学中，又特别注意程朱的观点。在我看来，程朱当然不能不注意，但若同时注意到和程朱有不少差别、甚至反对程朱的王船山、颜元、顾炎武等人的材料，将更能说明他的观点和结论。毛泽东在青年时期确曾受过程朱的影响。但在老师杨昌济的影响下，更为向慕王船山的道德学问。他曾经常偕同蔡和森、萧子升等朋友，参加“船山学社”的活动。1937年他为在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而备课时，结合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问题，又曾研读过《船山遗书》。王船山反对“离行以为知”，强调“知行相资以为用”，认为“知之尽，实践之而已”。这些观点比程朱和王阳明更接近马克思主义，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更大。

作者在比较中的某些具体观点，似还应该进一步斟酌。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质”、“量”定义和儒家的“理”、“气”定义，“非同寻常的相似”。在我看来，儒家的“理”近于马克思主义中的“规律”概念，“气”则是标示物质本体或物质形态的概念。所以“气之理”，可以解释为“物质的规律”。一般说，儒家重视事物“质”的区别，而对“量”的分析重视不够。不过在儒家学说当中，同样也注意到量变、质变的现象。《易传·系辞》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积”属于量的变化，“成名”、“灭身”则是质的变化。荀子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意旨相同。荀子还从理论上概括为“尽小者大，积微者著”。东汉王符也说过，“积微成显，积著成象”。只是关于“质”、“量”及

其变化尚未形成稳定的对偶概念。

本书用大量材料说明，儒学和马克思主义有不少相似或相通之处。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李约瑟曾有一个说法：辩证唯物主义起源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使之与现代科学相结合之后，又回到了它的发源地。先生提到了这种说法，但存而不论，未置可否。我认为，马克思主要的还是总结了西方哲学的优秀传统而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由于地域相隔，即使到了19世纪，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哲学仍然知之很少、很浅。这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对中国哲学介绍之简略，即可证明。而现在没有材料说明，马克思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比黑格尔更多。然而不但西方，中国古代同样具有自己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传统。因而中国传统哲学，包括儒学在内，和辩证唯物主义有相似、相通之处，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自然，中西哲学的发展，各有自己不同的历史道路和历史特点。在近代，西方辩证法的传统基本中断了，代替它的是形而上学不变论的统治。而中国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传统则一直延续下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哲学以《周易》古经为开端，“《易》以道阴阳”，其影响极为长久和广泛。因而中国传统哲学较之西方传统哲学，更具有辩证的性质。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否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关于儒学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中国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曾发生过严重的失误。一个时期，好象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儒学必须完全否定。但是，从延安到北京，毛泽东的著作和他的一贯思想并不是这样。他的文章和讲话，很喜欢引用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言论。他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还常常强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对象主要是儒家文化和儒家哲学。既要继承遗产、既要取其精华，则意味着要把它的某些思想内容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之中。这本身就承认了，儒学的精华是和马克思主义相通

的。

本书还一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的未来，儒学能否再次恢复它在昔日的盛荣。这实际涉及到中国未来文化的建构。作者承认，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在未来的中国文化中，由于马克思主义起着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必然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各派学说，都将在现代化的实践中接受检验。凡是一切有利于现代化的思想成分和思想遗产，都将继续保持其价值，而得到继承和发扬。同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人以自己为主体，还要学习和吸收国外一切优秀的文化。在这样一种文化结构中，儒家要恢复昔日独尊的地位，根本是不可能的。中国现代化的问题，首先是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从儒家学说的思想内容来看，它无法完成这个重要的历史任务。但是，人类社会是一个群体系统，只要社会群体还存在，人际关系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中国现代化必须通过社会群体来进行，人际关系也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题目。而儒家学说非常重视调节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追求人际间的和谐和整个社会的和谐。这一方面，道家不予过问，墨家和法家都过于片面。马克思主义对人在生产中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关系做过深入的研究，对更广泛的人际关系目前研究还不够。儒学在这方面的思想精华，将会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或社会学。至于先生论述的儒家和道家的阴阳辩证观念，如果充实以现代科学的内容，也会丰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过去，由于马克思对中国哲学了解不多，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精华，便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另外，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世界哲学，也发表了不少的见解。我个人虽然并不完全赞成，但认为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和学术价值。

中国古老的《诗经》上说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我在上面写了自己的一些感想，也是同窦宗仪先生互相切磋，互相琢磨。

刘文英

1992年4月10于兰州大学

中译本序

这点研究心得，终于在刘成有先生的精心翻译之下，以流畅的中文与故国见面了。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荣幸的事情，因为致力于这个题目的研究，本来就是针对故国而发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近代中国在欧美工业文明的冲击和帝国主义者的欺凌中，能起死回生，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极大的牺牲和艰苦的奋斗而取得的。可为什么马克思本人针对西欧、北美社会而作出的结论以及提出的行动原则，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起，迄今没有在那里实现，反而在马克思没有预期的中国，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算起的短短的28年中，就把儒家思想支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改建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度呢？更重要的是，具有最悠久的历史并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会不会象过去那样，因融汇印度文化而产生新的中国文化模式，从而为世人所向往呢？

这些问题是非常复杂、非常艰巨，同时又是至关重要的，很难回答。但知难而退，又不是治学的态度。所以，一点一滴的有系统的研究工作，还得要做。第一步，似乎应该分析比较马克思主义和儒家（尤其是新儒家）的基本哲理，看看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大凡一种思想体系和制度要移植到另一种思想体系和制度之内，两者如果越接近就越容易开花结果；两者如果差距过大，那就很难适应。历史上的两种文化的交融演变，大致都遵从着这个历史法则。尽管它同近代的经典物理学中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不太协调，但自从量子力学创立以后，人们又发现经典物理学中的原则有其局限

性。因此，从终极实在的观点来看，这个历史法则又有其普遍性。所以用它来衡量马克思主义和宋明理学（新儒学）的哲理系统，仍然是有科学基础的。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理系统有两大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引申和应用，与辩证唯物主义相比较而言，其地域性和时代性较强，从而也较为次要，所以我先从辩证唯物主义入手。通过20来年的分析研究，我发现两者大同而小异。两者的基本前提非常相近，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以“斗争”为主，而儒家以“中和”为主。这就是本书的大意所在，无怪乎陈荣捷先生评论此书说：只讲“同”而不讲“异”。可是我还没有象李约瑟先生那样过火。他说：“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见李约瑟：《今日中国的过去》，载《百年周刊》杂志1960年第5卷第2期第288页）当然，儒家的“格物致知”，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周敦颐的《太极图》，似乎是黑格尔思想的先驱，但并没有多少科学性。然而，如果把宋明理学的哲学体系和别的各种哲学体系作一番比较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太极图说》中的思想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最为接近。正由于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雅各伯森（Jacobson, N.）教授指出，本书提供了详实而又确凿的证据。国内学者中也有人持这种观点。今年（1990年），越南战争中的英雄武元甲在他的回忆中说，他之所以皈依马克思主义，一是为了抵抗帝国主义，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理和他所接受的儒家哲理最为接近。越南学者中坚持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越南是这样，中国何尝不如此？一位出国访问的人类学教授对我说，他历经欧美，最难解答而又常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突然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度？他说看了本书以后，才恍然大悟。

说来也奇怪，量子力学的进展对辩证的概念有更大的启发意义，但对唯物主义认识论却大有怀疑之处。可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竟和儒家、道家所提倡的“相反相成”的思想不谋而合。量子力学的创始人玻尔（Bohr）以太极图象为其勋章的标志，其用意或在于此。近年来学术界不断地指出这个通同之处。去年（1989年）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休斯（Hughes）在其《量子力学》一书的“序言”中说道：“无疑地，量子力学原理是和儒道佛哲理相同的。”我个人近几年之所以提倡“阴阳辩证一元论”，其原因也在于这些新的科学发现。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甲午战争失败后，国亡种灭，几在眼前，有人归罪于宋明理学，而且认为中国文字作祟，倡议拉丁化者，时有所闻。今天，量子力学称雄世界，电脑化的信息世纪即将来临，积微几何问世以后，科学界又认为中国象形文字最符合新科学，有人提倡中文电脑国际化。（见Jurgens, H.《积微语言》，《科学美国人》杂志1990年第8期第61页）尤其日本人没有埋怨宋明理学，不谈汉字拉丁化，而其科技成就，今天凌驾欧美，举世为之惊奇。1987年我去日本京都向国际形上学会介绍“阴阳辩证一元论”时，东京大学教授和九州大学教授自动地站起来说：“日本人欠中国的文化债已有一千来年了。”听后使人实在难以自己。

这点研究心得原是用英文写成的，旨在使国外对故国文化有较深程度的了解。美国大学用书出版公司两版后，经刘成有先生翻译润色又来到故国，若能起到抛砖引玉、舍短取长的作用，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本文是1990年8月24日应邀在联合国纪念史瓦西（Albert Schweitzer Colloquium）座谈会上的发言，今稍作整理，权作拙著中文版的序言。

窦宗仪于寓所

第二版序

本书是我系列研究的一部分，其目的是想要揭示出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之间融合的可能性和潜在性。初版于1977年，此后，我的知交N.P.雅各伯森教授送给了Davition学院的E.F.帕特森（Patterson）教授一本，并请他指正。帕特森教授说：

“我不能保证窦教授对儒家思想表述的准确性，但我相信我有能力证明：他完整地把握了马克思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也完整地把握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尽管他对后者的描述体现出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托尼奥·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即文化霸权的概念，并因而提高了自身的价值。我并不感到惊讶，儒家会在许多方面得出马克思那样的观点和结论，而且是在马克思之前……李约瑟早就使我相信，当我们学到所有那些关于中国人所了解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早在希腊人之前，就已经有了格言……”

就我对儒家思想的理解而言，我觉得要比理解马克思主义容易得多。因为一个儒家哲学系统的发展在西方的参照系内仍然是缺乏的，所以我试图构造一个体系，以便使它与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比较能够变得更简明一些。使我惊奇的是，除了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在西方哲学系统中没有一个与儒家思维更为一致；而且，两家在辩证唯物主义上的一致远大于在历史唯物主义上的一致。这使我相信，二者之间的融合是可能的。但何时融合，只有时间才能够作出回答。

雅各伯森教授和帕特森教授对我的鼓励，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也必须加倍努力来完成历史唯物主义上的比较。这项工作不可能耽搁得太久。

1980年于寓所